



进展不断,分歧犹存
第七届中美战略核动态战略对话
暨
首届中美太空安全对话

会议报告

拉尔夫·科萨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太平洋论坛, 主席),

顾石盟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太平洋论坛, 执行主任),

戴维·桑托罗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太平洋论坛, 资深研究员)

编辑:戴维·桑托罗, 翻译: 申屠宇静

问题与分析 第13卷, 第6期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3年1月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 (CFISS)

由中国非现役军官成立,经授权从事商业以及战略研究。基金会每年出版书籍和年度期刊,并积极开展与海外同行和相关机构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主办对政治/军事,包括未来安全环境进行探讨的重要会议。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CSIS)

设在檀香山的太平洋论坛 (www.pacforum.org)是总部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亚太地区研究中心。论坛的议题包括当前和新兴的政治,安全,经济,商业和海洋政策问题,致力于与该地区学术,政府和企业界的领袖人物进行对话。太平洋论坛成立于 1975 年,与环太平洋各地区的研究机构开展了广泛合作,借鉴亚洲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普及项目研究主要分析成果,为该地区的决策者,政府和公众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目录

鸣谢	iv
----------	----

主要成果综述

第七届中美战略核动态战略对话	v
首届中美太空安全对话	ix

会议报告：

第七届中美战略核动态战略对话.....	1
首届中美太空安全对话	23

附录

附录 A：第七届中美战略核动态战略对话

会议议程	A-1
与会者名单	A-5

附录 B：首届中美太空安全对话

会议议程	B-1
与会者名单	B-3

鸣谢

这份报告通过第 N00244-12-1-0040 号合同，得到了美国海军研究生院（NPS）当代冲突中心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先进系统和概念项目（PASCC）的部分资助。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先进系统和概念项目（PASCC）获得美国国防部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的支持。

主要成果综述

第七届 中美战略核动态战略对话

2013年1月28-2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太平洋论坛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在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反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先进系统和概念项目 和美国国防部国防威胁降低局支持下，共同主办了第七届中美战略核动态战略对话。一共有大约80名来自中方和美方的专家，政府官员，军队军官和观察员及八位太平洋论坛青年领袖以个人身份出席战略对话。中方派出了资深代表团，中方与会人员资历与去年的会议持平，包括几位现役的“二星”将领，及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重要代表。与会人员参加了为期两天的非公开讨论，重点讨论了核政策，当前的核扩散挑战，跨域核威慑，核危机管理，以及双边合作前景等。本次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

体现了一些分歧。由于中国对待其邻国的日趋强硬态势（美方的观点）和/或受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中国的邻国（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开始逐渐挑战中国领土主权（中方的观点）。双方不仅在会议议题上，并且在中美双边关系的整体认识上都受到各自不同立场的影响。一些与会中方人士认为纷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使得原本敏感的核问题讨论变得更加困难。

由于过去的会议已经使双方相互熟悉，对话在总体上得以在积极合作的氛围中展开，尤其是在讨论到将来潜在的合作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公共利益”的定义及保护等相关议题时。中美双方与会人士都非常重视以一轨半和二轨外交的方式来参与讨论核战略及相关政策，认为将来正式官方层面的讨论得以启动，此类对话将为官方正式对话奠定基础，并将确保正式对话的进度和成果。

中方的与会者并没有强调其往常的关注点。他们几乎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也未进一步呼吁美国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较少提到对美方舰艇入侵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不满。在往届会议上关于空海一体战的激烈争论，并没有在此次会议中被再次提起。取而代之的是2013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其被引述为美国敌对意图的最新“证明”。中方与会者援引了国防授权法案中“针对”中国的具体条例，特别指出其中要求美国战略司令部递交一份有关中国地下隧道网络涉及藏匿大批核武器的研究报告。由于奥巴马总统签署通过了这项立法，此最新《国防授权法案》也被看作是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在一份认真准备的声明中，中方一位长期参与发展核武器的资深退休官员断然并公开地否认了中国在隧道里藏匿核武器。

中方与会者肯定了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内对核军控和安保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对其第二个任期内在美俄进一步削减核武库和批准“全面核禁试条约”方面可能取得更大的进展持乐观态度。鉴于俄罗斯和美国国内政治的限制，美方与会者对此并未持如此乐观态度。

中美双方的与会者都同意进行一个话题更广泛全面的对话，而不是仅仅囿于对核动态的关注。导弹防御，空间安全，网络安全和常规武器动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值得积极探讨的。除此之外，与以往讨论此话题时的态度相同，中方与会者一致担心讨论“核威慑”，或专注于双边的核武领域可能导致双方关系中竞争的要素得到强化。

的核脆弱性，但仍表示了对美国日益趋向发展相关能力（通过先进的远程常规武器和“多层”反导防御系统）以绝对优势抵消中国核威慑的关注。一些中方与会者提出美国在追求“绝对安全”，并指出这会牺牲损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

中国将继续高度重视中国将继续高度重视维持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中国虽然致力于保持适度的最低核威慑能力，其核武库的大小最终决定于美国抵抗中国第二次核打击的能力。

中方与会者继续坚称，鉴于美国和俄罗斯拥有的庞大核武库，美俄应承担率先推动核军控和裁军议程。美方与会者没有反驳中国加入核裁军“为时尚早”的观点，但强调中国的核政策及其缺乏透明度会给美俄进一步削减核武的前景带来负面影响，并使两国担忧中国进行“核均势冲刺”的可能性。

中方与会者似乎不太赞同中国的核政策、其低透明度、以及持续增加的核武数量（中方觉得是有理有据的）对新一轮美俄双边核削减谈判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中方与会者同意中国（和其他核武器国家）有必要“在下一轮或两轮的美俄双边核削减之后”加入美俄军控会谈。

中方与会者仍然认为美国的防核扩散政策是建立在双重标准的基础上，注重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而忽略了以色列和印度的核问题。（在此中方鲜少提及巴基斯坦。）中方与会者承认朝鲜是中美双方的共同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很少有人提及以六方会谈作为解决方案。

中美双方与会者同意在防核扩散领域的总体目标；但双方未能就如何实现防核扩散或防核扩散的优先性达成一致意见；中方承认防核扩散对中国的重要性不如其对美国的重要性。中国提倡以共同参与磋商，对话及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而美国则不排除使用更广泛有力的举措，包括制裁。双方几乎没有讨论如何定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核保障协定所规定的违约行为或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几位中方与会者强调了延伸威慑（ED）的不稳定性，并指出美国一直寻求通过其再平衡策略加强延伸威慑（ED）。美方与会者着重指出延伸威慑（ED）具有增强地区稳定的效果并有益于亚太地区防核扩散。正如在以往的会议上一样，此次中方与会者对美国在亚洲的联盟政策普遍持批评态度，然而较过去而言，此次中方与会者更多地肯定了延伸威慑（ED）在防止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能力的作用。中方倾向于一个更具合作性和包容性的亚太安全框架。

中方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深表疑虑。这一战略被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在众人眼里，尤其是公众、学术界和军事界，普遍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掩护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富有攻击性姿态，并企图赋予其盟友挑战中国的能力（特别是当“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延伸威慑策略相结合时）。中国的精英层更倾向于对再平衡战略在“有关于中国”和“针对中国”之间作出区分，从而看到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尽管再平衡战略所宣称的重点在于外交，经济发展与国防三方面，但中方大部分与会者更强调其军事层面的含义；部分与会者建议，美国需要“再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即针对中方指出的不当之处作出调整和让步作出调整和让步）。

会议中会议中一个得到主要关注的主题是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美国和中国可能被被动地卷入冲突。中方认可这种对“第三方”因素的顾虑适用于朝鲜问题，但他们更多的关注与日本在钓鱼岛/尖阁列岛的争端；他们也偶尔提到菲律宾及越南。然而鲜少有人提到这些潜在的冲突可能升级为核冲突。

中方与会者对美国在钓鱼岛/尖阁列岛争端上所持有的立场尤为不满，认为美国偏袒并支持日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方特别批评了克林顿国务卿对此争端的处理方式，表达了对新任国务卿克里的殷切期望，并视其言论较为全面平衡且能理解中国的顾虑。

中方与会者对中美军方开展在包括核问题上的双边军事交流提供了积极的口头支持，但对于哪些是“合适的讨论议题”并没有提出太多建议，而是强调有必要共同制定议程。与以往的讨论一致，中方与会者没有提如何启动中美军事会谈的相关见解。

据一些中方与会者所言，由于对中美核对话可能重蹈美国和苏联核会谈的“对抗性”模式的顾虑，中国仍然比较抗拒进行正式的官方双边核对话。也有人担心一旦与美国进行核战略对话，中国将被要求立即提高核透明度。未来的对话有必要就推动核透明度的新方法及新途径进行更多讨论。

与以往的座谈一样，中方与会者，无论是私下里，或甚至在公开的讨论中，都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只是一个政策执行单位，强调其在中国的核政策制定中不发挥作用。虽然这并不排除二炮参与双边核对话的必要性，但其参与的讨论重点应更多地放在操作和程序层面的问题上。

中美与会者皆承认网络攻击对关键基础设施构成威胁。这可以成为一个中美关于建立互信和制订行为准则的新的讨论领域。一些中方与会者把美国用 Stuxnet 蠕虫病毒袭击伊朗铀设施看作实行网络攻击的一种行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并担心这种行为为将来类似的攻击树立了危险的先例。

中方与会者表达了进一步研究核危机管理的意愿，并正在探索可能的核危机管理模拟场景。有人建议先研究涉及其他核大国 -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场景，而不是直接探讨涉及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核危机。

双方与会者大力支持继续这项中美战略对话，并提出可以增添一个模拟核危机场景的桌面演习，比如可以讨论如何应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危机。未来双边对话的主题可以包括更加深入的探讨多边军控方案（尤其是在五个常任理事国（P5）范围内）；跨域威慑和保护“公共利益”；危机管理（尤其是确定潜在的核危机）；更好地从技术层面了解关键领域的军事能力，而不是通过传闻进行臆测；研究网络攻击的危险性；威慑信号如何发挥作用及为何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可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例）；以及进行战略相互再确认的关键要素等。进一步讨论如何理解习近平所期待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话也将是有益的；中方与会者曾频频提到“新型大国关系”，却未能充分阐释这一概念。中方表示愿意在核军备控制核查手段和相关实践方面进一步加深理解。

美方传递的主要讯息是：双方应该继续着眼于共同利益；应该尽早启动 1 轨正式官方对话；双方应该一起在概念层面探索共同面临的挑战（例如进攻/防御稳定性，跨域升级等等）；双方应着重于未来的合作，而不是沉湎于过去的不快；双方应共同研究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而避免纠缠于不能合作的领域。

观察而言：中方与会者，可分为两类：核心圈里的专家：他们具有务实和前瞻性思维的特质；以及只看重罗列肤浅的谈话要点的圈外人士。在核心人士当中，尽管对双方当前的战略关系状态有一些轻微的失望，但他们普遍对于推动中美双方进行一轨半/二轨外交及一轨官方正式对话的前景持审慎乐观态度。虽然一些旧的话题（绝对安全，双重标准等）时不时地出现在对话中，但中方与会者分析了双边战略关系上已取得的进展，许多核心人士与美方同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起到了良好的激发讨论的效果。

主要成果综述

首届中美太空安全对话

2013年1月30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太平洋论坛在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反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先进系统和概念项目及美国国防部国防威胁降低局的资助下，举行了首届中美太空安全对话。对话汇聚了大约40名来自中方和美方的专家，官员和观察员及八位太平洋论坛青年领袖，他们以私人身份参加了为期半天的太空安全政策对话。本次会议的主要结论包括：

会议的基调是非常积极的，双方都就加强太空安全问题的双边合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尽管如此，中方的第一位发言者强调，中方感到在太空合作领域遭受美国的法律和行政限制的“一再羞辱”，而这种感觉是妨碍双方开展对话的极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加以解决。美方与会者回应称美国国会的这些限制主要涉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活动，并不会阻碍中方与美国其他处理太空问题的政府机构进行开放式的对话与合作。

中方与会者肯定了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太空政策“总体积极”的转变。中方强调，与美国不同，涉及到太空问题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学生”。中方还坚持认为中国政府有关太空的政策和态度是非常负责任的。中方与会者对美国空军提供的空间碎片数据和太空拥堵/碰撞预警表示赞赏。

中方与会者坚信，在原则上，中国政府现在是愿意开展太空合作的双边对话的（以前仅表达了对多边对话的兴趣）。可能的讨论主题包括了解双方共同的想法和目标，相互信任措施，了解双方基本的利益和关切点，并展开更具体的问题探讨，如太空碎片，合作规避太空碰撞，及科学和技术合作。当美方的提案开始涉及或集中于关注太空碎片问题时，中方往往视此为对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及其能力的攻击。

中方与会者试图淡化美方对中国反卫星试验的担忧，称中方的反卫星武器技术层次偏低，并且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多边会谈解决。一位中方与会者还强调，美国仅在中国的反卫星试验之后才提出愿意进行太空安全对话，这表明美国的目的是为了限制中国反卫星武器能力的发展。美国空军 X-37B 轨道测试器因其据称的“擒获和破坏”卫星的能力再次被中方关注。

一位中方与会专家列举了对中国一位中方与会专家列举了对中国的有限威慑可靠性的担忧，并建议美国单方面承诺不部署天基武器系统。一些美方与会者指出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原因部署空间武器的可行性非常小。

中方与会者认为，由于美国致力于谋求太空主导地位 and 太空武器化，所以虽然美国的政策随奥巴马政府执政出现了转变，美方还在持续抵制俄罗斯和中国关于签订太空军控条约的建议。中方首次表示外太空安全应该包括地面系统（比如地面站），也表示欢迎就限制太空攻击性行为进行讨论。而之前中方一直对限制行为的讨论持抵制态度。中方与会者也表明了中方愿意讨论在日内瓦所提的倡议内容，包括可能增加的陆基系统测试的禁令。双方的空间安全共识包括了地面系统[例如，地面站] 同样涉及太空空间站，也表示欢迎就限制太空攻击性行为进行讨论，如反卫星武器是另一个颇受欢迎的说明，较部署太空武器而言，中国在一直以来提倡限制太空进攻性活动。

美方与会者解释华盛顿对太空条约的疑虑主要是美方与会者解释说华盛顿对太空条约的疑虑主要是由于其不可核查性，并且鉴于俄罗斯和中国在防扩散领域有不严格遵守条约的先例，美国有理由怀疑中俄是否将认真遵守太空条约的规定。中方与会者回应说，只要科学家们做出足够的努力，他们总能想出解决办法。中方还宣称，太空核查是“重要的，但不是不可或缺的”，并指出其他条约如“外层空间条约”，也不可核查。况且，美国还可以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随时选择退出条约。

控制冲突升级在太空领域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些与会者建议对承诺不首先使用太空武器给予更多的思考和探讨。在此过渡期间，应采纳其他形式对太空活动进行控制或规范。

虽然中方与会者对欧盟的太空国际行为准则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比如缺乏强制性，过于重视太空碎片而忽略其他问题等。但中方普遍同意，应该继续推动此类努力（包括那些旨在缔结条约的努力）。中方一再重申，中国对太空行为准则持“开放”态度，一位与会者甚至称其是“非常重要的”，并指出中国正在与欧盟讨论这个行为准则倡议。与几年前中国的态度相比较，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

中方与会者特别强调指出，一些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和日本都在投资空间计划。因此，多边的会谈讨论也非常重要。中美双方最大的共同利益，是在全球范围内避免太空武装冲突。

与会者普遍同意，此届中美太空安全对话非常有益，并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会议报告

第七届中美战略核动态战略对话

- 中国核战略关系历来困难重重。虽然多年来双边关系已经得到逐步改善，但关键的分歧依然存在。然而，两国之间还没有开启任何正式的官方对话来讨论这些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战略核动态在整个亚洲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减少其核武器数量并降低核武器的重要性，中国正在扩大其核武器库，新核武国家在建设其核武器库（印度和巴基斯坦），其他新兴核武国家（朝鲜）则正在涌现，其他一系列的新技术比如导弹防御系统和远程常规打击力量正在开始影响战略格局。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CFISS），于2013年1月28-29日共同主办了第七届中美战略核动态战略对话。此次对话得到了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反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心之先进系统和概念项目和美国国防部国防威胁降低局的资助。双方力图加深在这些问题上的彼此了解，以促进中国和美国之间更多的双边对话和互信，并为最终促成与中国官方的正式双边和/或多边军控谈判作准备。

此届中美战略核动态战略对话正值美国总统奥巴马取得连任和习近平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不久，这个关键时刻提供了更多机会来厘清中美双边关系的现状。一共有大约80名来自中方和美方的专家，政府官员，军队军官和观察员及八位太平洋论坛青年领袖以个人身份出席战略对话。中方派出了资深代表团，中方与会人员资历与去年的会议持平，包括几位现役的“二星”将领，及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重要代表。与会人员参加了为期两天的非公开讨论，重点讨论了核政策，当前的核扩散挑战，跨领域核威慑，核危机管理，以及双边合作前景等。部分与会者还参加了为期半天的太空合作对话。

背景和防扩散状况

我们先请中国和美国的与会者对全球核战略和防扩散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估。美方发言者强调，亚洲和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虽然中东问题仍然占据美国决策者的很多注意力，然而随亚洲日益成为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中国无疑是亚洲的关键国家。

然而，就许多人而言，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尚不明朗。美国在亚洲有其重要利益，比如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及对其盟国的防务责任，并确保贸易自由。然而，亚洲的战略环境仍在不断变迁，因此，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较其他地区更具可塑性。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现状。美国意识到要更加关注亚洲，但是再平衡战略并未提出华盛顿具体应该怎么做。

美方与会的发言者认为一位发言者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该地区未来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将在地区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涉及能力和意图两方面。关于能力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将持续其目前高速增长的轨迹，北京是否将继续投资建设其已经很强大的军事能力等都存在疑问。关于意图方面，目前还不清楚北京政府是否仍将继续坚持邓小平保持克制和维持现状的政策，还是会选择一个更具扩张性和攻击性并会挑战现有秩序的政策。

根据美方发言者的解释，在中东战争即将结束和美国面临新的预算压力的关键时刻，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和核政策。美国国家安全的辩论焦点集中在美国是否需要准备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有观点认为，大国之间进行战略竞争的事情已成为历史了，美国应该集中军事投资于其他计划上；在核政策方面，应致力于核裁军，优先确保核武器不扩散和增强核安全。其他观点则认为，大国冲突可能重现，华盛顿需要为此作充分准备并使核武库实现现代化。奥巴马政府似乎试图跨越此分歧，在谋求减少美国核武器总数的同时却不影响其基本核政策。

虽然美国政策有重要虽然美国政策有相当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如美国参与亚洲事务和支持其盟国），但美国未来的政策仍然存在很大的调整空间，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选择。由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倾向于维护现有格局，两国之间未来究竟是竞争还是合作将取决于中国对此的抉择。

发言者在总结中提到了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伊朗和朝鲜核计划的影响和关于无核武器世界的争论。对于防止德黑兰和平壤发展核武器，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双方未能就如何防止德黑兰和平壤发展核武器达成一致。如果这两个国家发展出成熟的核武器能力，中美之间的相关政策协调将是必不可少的。在讨论无核世界时，发言者认为，如果无核世界的倡议将来失去其影响力，美国和中国（及其他国家）就需要寻找一个替代性框架来处理未来的双边关系。

中方发言者一开始就强调，奥巴马政府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在其第一任期内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提及了美俄签署的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及随后的实施，美国有关继续核裁军和降低核武器作用的讨论，对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的初步讨论，及对核安全的高度重视。虽然中方期待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能取得好的成绩，中方发言者也指出了众多的挑战：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危机，南亚国家逐渐增强的核力量，以及核恐怖主义的持续威胁，以及尽管核裁军的呼声升高，现实情况是大国关系继续基于相互确保摧毁，这也是中方所担忧的。

与会的美方发言者这位发言者指出了两个关键的战略趋势。其中一个战略趋势是美国发展导弹防御（MD）和远程常规武器（包括巡航导弹）的能力，并越来越多地使用太空和网络等领域。这些发展有助于帮助华盛顿防止其他国家进行核反击。另一个趋势是日益重要的地区安全问题。这包括潜在的美国导弹防御（MD）会改变欧洲和亚太的区域战略平衡，美国延伸威慑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以及美国寻求“绝对安全”的持续努力（中方的理解）。

与会的中方发言者最后指出，中国不希望加入军备竞赛，但当其他国家壮大自己的力量时中国不能停滞不前。尽管如此，中国仍坚守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并致力于保持有限的核威慑能力。

在讨论中，中方肯定美国过去四年中取得的成绩，并对奥巴马总统在第二个任期内取得更多的进展普遍持乐观态度，不管是在美俄进一步核裁军方面还是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方面。相比之下，鉴于美国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的限制，美方似乎对此不太乐观。事实上，现在即使是最热衷于军控的专家们也正在讨论美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寻求传统的条约框架之外的合作模式。然而，一些与会的美方人士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试图在他的第二任期进一步推动军控议程，政府官员也正在考虑专家们提出的相关建议。

总体来说，中方与会者认识到，美国默许与中国达成“战略稳定”实质上接受了中美之间存在互相的核脆弱性。与此同时，中方反复强调了其对美国试图提升其战斗力（通过先进的远程常规武器和“多层”的导弹防御能力）消除中国核武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忧虑。一些中方与会者时不时指责美国寻求“绝对安全”并指出美国所冀图取得的安全利益牺牲损害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比如一位中方与会者指出，“美国谋求压倒一切的优势，把其他国家逼入墙角，意图过河拆桥”。美方与会者反驳强调，美国的反导能力是针对朝鲜和伊

朗而非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并以美国主动给其陆基导弹防御设限作为例证。美方与会者否认了“绝对安全”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并强调了其根本无法实现。一些中国专家（主要是一些经常参加此对话的专家）肯定了这一论点。

与以往对话一样，中方与会者强调，中国将继续高度重视维持其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中国同时致力于保持适度的最低限度核威慑能力，其核武库的大小最终将决定于美国的抵抗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大小。

伊朗和朝鲜核问题

对话第二部分，双方与会者深入讨论了当今两个最迫切的核扩散挑战：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关于伊朗核问题，中方的第一位发言者重申中国赞同实现一个和平的无核武器的中东，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中国积极支持建立一个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

与会的发言者肯定了伊朗核问题正面的事态发展鼓励了对此问题的乐观态度这位发言者认为伊朗核问题呈现有积极的一面，因此我们可以持适当的乐观态度：伊朗既没有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也没有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它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谈判。即使谈判一直没有显著成果，但各方仍同意继续谈判。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公开宣称其无意于发展核武器，称发展核武将不符合其宗教教义。

中国和美国有共同的目标：防核扩散及中东的和平与安全。然而，这位发言者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与美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认为伊朗是一个友好的国家并且中国与其保持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中国不希望伊朗的政权出现更迭。此外，中国的基本立场是，伊朗应该被允许拥有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并且，虽然中国与以色列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如果需要的话中国仍然会批评以色列的政策），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更加特殊。

这位发言者认为伊朗不冀图发展核武器。然而，至少从目前来看，伊朗试图拥有可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他认为，伊朗可能会想采用类似日本的政策，即拥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核武器的能力。

中方与会的第一位发言者坚持认为这位发言者坚称，目前还不清楚，制裁能否阻止伊朗核发展核武。更糟糕的是，制裁实际上刺激了伊朗发展核武器。这是中国不太支持制裁的理由，也是其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制裁的原因。他总结强调，要求伊朗放弃铀浓缩和后处理设施已无现实可能，特别是当日本等别的国家也拥有类似的能力。美国和伊朗在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时应更加灵活，更加积极开展对话；华盛顿政府尤其需要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和防止其对伊朗使用武力。

中方与会的第二位发言者着重讨论了朝鲜核问题。他指出了朝鲜在核武和导弹技术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对东北亚以及中国和美国而言是重大的安全挑战。这使得朝鲜半岛存在军事危机和激烈冲突的危险及发生大范围核扩散或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这位发言者认为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特别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此外，朝鲜核问题为两国加强双边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位发言者也承认，中美两个国家在朝鲜核问题上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中方着重于采取“全面措施”，以对治核扩散的“症状和根源”。中方不认为制裁或施压会得到好的效果。如果根源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会适得其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盛顿认为核扩散问题比任何与之相关的其他政治问题都应首先获得解决。此外，这位发言者声称华盛顿倾向于制裁及施压而非开展外交斡旋和对话，拒绝直接与平壤对话，而且不再认为六方会谈是有效的。美国总是认为美国自身拥有的核武威慑力对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这位发言者还说，美国的策略主要旨在对后果进行管理：其目的是利用制裁限制朝鲜核能力和导弹能力的发展，阻止平壤的军事挑衅（且加强其与韩国和日本的联盟以准备应对任何地区冲突），并且用各种手段如“防扩散安全倡议”来防止朝鲜核扩散。

中方与会这位发言者称中国和美国对朝鲜核问题之所以采取如此不同的处理方式，是由于两国所寻求的最终结果不尽相同。中国期望朝鲜政权的体制转型，而美国谋求朝鲜政权的更迭。但是，这位发言者认为政权更迭将不会成功。正如伊拉克，政权更迭将导致朝鲜半岛混乱无序。制裁和施压不会使朝鲜放弃核武计划。如果平壤政府认为朝鲜政权面临着生存威胁，制裁和施压是不可能阻止它发展核武的；他援引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话说，“即使 [巴基斯坦人] 为此不得不吃草，巴基斯坦也必须发展核武”。

因此，谋求朝鲜政权的体制转型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朝鲜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促使其发展核武的动力可能会大大降低。为实现这一点，必须更加注重采取政治步骤，即接受朝鲜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平壤曾经表达过愿意改变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愿望，尤其是与美国。朝

鲜外交部在 2012 年 8 月发表了一份长篇备忘录，文中抱怨其依然被视为敌人，其主权国家地位迄今未被承认，未能被国际社会视为平等的一员。中方发言者指出美国拒绝承认朝鲜作为一个可以与其共存的主权国家，并且华盛顿政府倾向于对朝鲜进行制裁和施压。这位发言者还说，朝鲜对外交斡旋和对话能够比较积极地响应：平壤政府总体上遵守并执行了“框架协议”；当其发现有可能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他们主动冻结了在宁边的钚设施。

中方发言者认为目前存在着推动朝鲜政权进行体制转型的机会。金正恩曾试图塑造与其父不同的形象，似乎更愿意优先考虑经济问题。并且目前韩国和日本的领导层正处于过渡阶段，这也为重新思考对朝鲜核问题的处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机会。中方发言者称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可以加深合作：中国应帮助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同时保持其国内的稳定，而美国应该帮助朝鲜改善其经济状况。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这种处理方式中，六方会谈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磋商平台。当然仍有不少关键问题可以通过双边，三方或四方会谈进行磋商。

与会的中方发言者美方发言者认为，中国对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的处理方式更强调和平与稳定以维护经济发展，更倾向于谈判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拦截、隔离、和制裁。华盛顿和北京彼此之间主要是缺乏共同利益，而非缺乏互信，这造成了沟通不畅。从根本上来说，与美国相比，中国不认为核扩散问题对其利益构成很大威胁。北京经常认为美国及其盟国以核扩散威胁为借口为其挑衅行为作辩护，进而要挟中国作出更大的安全利益妥协并意图限制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参与推动防核扩散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态度（或预期的态度）所影响，而不是受核扩散可能对中国构成的直接威胁的影响。

与会的中方发言者还强调，中国自我定位为既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P5）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它能够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担当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协调工作。相关事例包括了作为东道主的六方会谈和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开展的穿梭外交等。同时，北京倾向于将美国描述为“过度追求绝对安全”。关于朝鲜核问题，华盛顿政府拒绝给予平壤政府安全保证；就伊朗核问题，美国频频施压伊朗却对以色列的核计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刺激了中东核扩散。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美国将不满中国在帮助解决核扩散问题上的努力。而北京将美国视为问题根源之一，甚至是问题本身。北京也抱怨说，华盛顿总希望中国采取更多相应的举措却没有考虑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是否一致。另一个不利因素是，许多美国针对核扩散相关的制裁曾经用来对付中国，这使中国人担心如果今天赞同美国对他国的制裁会不会使得将来美国针对中国的制裁合法化。

与会的中方发言者最后总结，华盛顿政府应该更认真地在讨论中考虑中国的利益。美国应更好地向中国说明，为什么中国参与美国的防扩散努力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美国在解决核扩散问题上采取极端方式（如实施制裁或进行军事行动），这会促使中国采取抵制措施。

讨论表明中国和美国赞同防核扩散的总体目标，双方未能就防核扩散的优先必要性以及如何推动防核扩散达成一致意见。中方承认防核扩散对美国更加重要，对中国相对次要。此外，中国支持以共同协商，对话及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美国则不排除使用更广泛的举措，包括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准备采用军事行动。

虽然没有像过去那样强烈，但一些中方与会者继续指责美国防核扩散政策基于双重标准之上：它过于关注于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而忽略以色列和印度的核问题。几位中方的与会者还特别指出了日本的核问题，认为日本有能力用其反应堆级钚储备制造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在此处鲜少提及巴基斯坦。

美方与会者则反驳说指责美国采用双重标准是无根据的，因为以色列和印度与伊朗和朝鲜并不尽相同，以色列和印度从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方与会者还指出，将伊朗和日本相提并论是没有远见的，因为东京政府没有生产纯度为 20% 的浓缩铀，也从未进行过秘密的核计划，更未违反联合国决议进行导弹试射。与伊朗截然不同，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记录无可挑剔，也从未威胁叫嚣要消灭其邻国之一。

一些中方与会者同意美方与会者对伊朗正试图获得制造核武器能力的评估，但仍相信伊朗将不会组装核武器并实际部署。这不足以让中方支持对伊朗实施额外制裁。虽然中方和美方的与会者同意朝鲜核问题是双方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双方对最终前景存在分歧，中方倾向于实现政权转型，而美方更倾向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半岛统一。美方与会者驳斥了华盛顿在推动政权更迭的观点。与过去对话内容不同的是，中方在此次对话中较少提及六

方会谈作为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模式。最后，双方几乎没有讨论如何判断什么样的行动可视为违约或如何应对违约行为，尽管一些美国与会者曾试图了解中国对此的态度。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P-5)的军控前景

对话的第三部分着重于讨论多边军控的前景。美方发言者探讨了三种类型的核协议：一是旨在限制或减少核武力量的（类似于由美国和俄罗斯签署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二是不直接削减核武器，但有防止核军备竞赛的长期效应的（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另有一些是意图改善稳定性和提高国际安全，却还未达成正式协议的。

关于在限制或减少核武力量方面的协议，发言者承认对中国而言（更别说其他核国家）其正式加入美俄核武军控进程尚言之过早。北京曾明确拒绝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力量削减至非常接近中国核武库的水平之前加入这种谈判。由于美国和俄罗斯拥有的核弹头总数至少是中国的 10 倍之多，并且核军控协议的签署一般会历经 10 年左右的间隔，因为中国有可能在 2030 年左右加入美俄军控谈判。

中国仍可以以其他的方式参与军控谈判。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 的美国-中国核动态研究小组建议美国，中国，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包括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应禁止固定发射的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这将有效地增强危机稳定性。另外，中国可以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协商就一定射程之上的核弹道导弹的总数目进行限制，这将抑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备竞赛并且可以以此树立一个与中国的核政策相符的军控先例。

与会美方发言者认为，鉴于美国参议院目前的人员构成，美国不太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尽管如此，中美两国可以讨论一下在该条约得到双方的批准之后，两国可以做些什么。（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正式批约之后，中国会立即跟进）。华盛顿和北京可以一起携手合作去鼓励其他六个尚未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 - 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朝鲜和巴基斯坦 - 批准该条约。他还敦促美国和中国一起合作（并与其他家一道）说服巴基斯坦停止阻挠裁军大会的进程，尽快开始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

这位发言者谈到通过非传统形式的多边军控来推动核协议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根据他的观点，一开始可以以目前正在进行的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军控协商框架为基础。在中国的带领下，这五个国家正在试图制订一份核军控词汇表。五核国军控协商的另一个着眼点是条约核查：北京可以考虑鼓励五核国共同合作，以加深彼此对核查技术和主要困难的认知。中国也可以积极参与多边互信机制，例如可以同意对弹道导弹发射进行提前通知，或者与其他国家就应对核事故和进行核应急演练交换观察人员。

与会的中方发言者指出无核武器的世界是一个崇高的目标，这需要所有国家以不懈的努力方可能达成，尤其是五核国应负有特殊的责任。五核国于最近几年定期会晤讨论有关军控问题的“后续步骤”，但这个进程才刚刚开始开展，其前景取决于大国关系能否保持稳定、全球战略稳定能否得到维持以及五核国能否在核查技术开发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与会的这位发言者赞同在中国的倡导下编撰核军控词汇表是推动军控进程的第一步。然而，他再次强调，关键的是没有一方谋求“绝对安全”。相反的，所有国家都应保持克制并限制军备竞赛和进一步核扩散。

虽然中国正在发展其核武军事力量虽然中国仍在发展其核力量，中国已经在准备参与军控和裁军讨论。发言者建议中国应和英国及法国一起被邀请观摩美俄军控谈判。他还提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一起合作启动“禁产条约”谈判，交流技术信息以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派核查技术专家定期举行讨论。五核国还应该深入讨论以达成一个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可行路径：五核国可以制定一个路线图，包括讨论核裁军，核武器的禁止使用，以及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方式。发言者强调，至关重要的是最终所有核武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将能加入这些讨论。

坚持认为，美国和俄罗斯负有推动核军控和裁军的关键责任。中方认为中国加入美俄核军控进程的时机还未成熟。美方与会者并没有否认这一观点。不过，美方与会者强调了中国的核政策和缺乏透明度为美俄继续削减核武器的前景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华盛顿和莫斯科对中国可能会寻求“核均势冲刺”具有顾虑。一位美方与会者强调，美国并不寄望获知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也不要求北京承诺为其核弹头总数设一个上限），华盛顿只是期望了解对北京而言怎么衡量“多少才是足够”的核弹头数量。他强调，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正在寻找一切证据来证明中国拥有比大家所普遍认为的数量更大的核武库。北京政府提高核政策透明度将有利于打消这些疑虑和猜测。

也不认为中国持续加强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给未来美俄核裁军前景带来负面影响。当美方与会者质疑中国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款的履行情况时，中方与会者以中国的最低核威慑政策及中国对“禁产条约”谈判的支持作为中国切实履行了其义务的证据。更明显的是中国不再强调其将“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核军控会谈，而是说中国将在“一轮或两轮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进一步核裁军”之后加入这样的会谈。

随着更多细节的讨论以下的详细讨论将进一步显示，中方与会者整体而言对增加透明度的必要性持更加肯定的态度，并希望能更多地了解相关概念和其在美国和俄罗斯军控过程中的应用。讨论中提到了可以开展一次模拟核查演习以进一步了解如何在核查过程中体现透明。

亚洲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中战略稳定性的影响

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中战略稳定性的影响。与会的中方发言者认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有以下一些考量：亚洲与中国的崛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美国需要调整兵力部署，美国需要和当今最富活力的地区保持更紧密的经济联系等。起初，北京对此的解读是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的。后来，大家认识到再平衡战略不是完全针对中国的，但是也和中国有很大关系。至少中国精英决策者和安全专家的解读是这样的。然而，中国尚不清楚美国对中国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华盛顿是要谋求遏制中国？或是试图“应对中国崛起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是迄今还没有得到答案。

当美国决定派遣美军到澳大利亚达尔文时，中国开始严重关切其再平衡战略。这一军力部署及美国承诺对其在亚洲的联盟进行巩固（特别是强化在亚洲的延伸威慑），这些举措被视为对中国的公开对抗。此外，中国一直特别关注美国和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日益增强的军事合作，比如日本，越南和菲律宾。

尽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伦于 2012 年 11 月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讲话中强调美国希望与中国以伙伴关系进行合作，中方发言者仍然认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大于机遇：“这使得中国难以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大多数的区域争端中，尤其是钓鱼岛 / 尖阁列岛领土争端中，美国站在与中国立场对立的国家一边：这使中国认为华盛顿未保持中立立场。此外，中国一直被排除在美国在该地区推动的大多数区域性倡议之外，特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方发言者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再平衡战略使中国国家环境更加恶化，并增加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猜疑。

与会的美方发言者反驳称，“再平衡战略”未被正确解读，认为再平衡战略体现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结束后对亚太地区增加关注度的转变。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再平衡战略的目的是使美国与亚洲这一当今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他引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在《外交政策》（2011）的文章，指出该政策有三大支柱：具有前沿外交、经济和贸易，和军事力量。不幸的是，第一份有关“再平衡战略”的政策文件是2012年1月出台的美国国防战略指导方针，这造成了（错误）的印象，即美国再平衡战略重心在军事方面。

与会的美方发言者强调，再平衡战略并不是美国重返亚洲，因为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再平衡战略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冷战接近尾声时，乔治·H·W·布什政府认识到美国需要加强参与亚洲事务。美方发言者还指出，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毕竟，此政策的出台早于中国的崛起。由于中美关系基于合作和竞争，再平衡战略不是旨在对抗中国，但其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密切相关。

与会的美方发言者补充说，再平衡战略是对越来越多吁求美国支持的盟国所作的回应。日本曾表示了对中国的深切关注，大多数日本人（80%）认为中日关系欠佳。东京不断呼吁美国重申其对日本的防卫承诺，韩国正面临朝鲜的好战言论及其核武器和导弹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已经呼吁美国恢复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有些人甚至认为，首尔应该具备自主研发核武能力。尽管澳大利亚关于其未来战略的学术辩论也非常活跃，堪培拉政府仍一直在努力保持甚至加强其与美国的联盟。菲律宾和泰国也是如此：马尼拉政府积极谋求加强与美国的联盟（中菲在中国南海的领土争端是主因之一），曼谷对再平衡战略态度较不积极，但现在也已决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与会的美方发言者最后总结强调，美国的延伸威慑，加上导弹防御系统，起到了重要的防核扩散作用。事实上，日本和韩国都没有发展核武器，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体现了一些分歧。由于中国对待其邻国的日趋强硬态势（美方的观点）和/或受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中国的邻国（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开始逐渐挑战中国领土主权（中方的观点）。双方不仅在会议议题上，并且在中美双边关系的整体认识上都受到各自不同立场的影响。

中方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深表疑虑，但中方与会者的观点之间也有明显差异。虽然中方普遍对再平衡持有怀疑甚至敌意，一些中方与会者也坦承关于再平衡战略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弄清楚。北京政府希望得到“更多关于再平衡战略概念的解释”，特别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美国正式的官方文件来定义和解释再平衡战略。一位中方与会者坦言“中国很担心。对我方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美国说了什么，而是美国做了什么”。在众人眼里，尤其是公众、学术界和军事界，普遍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掩护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富有攻击性姿态，并企图赋予其盟友挑战中国的能力（特别是当“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延伸威慑策略相结合时）。中国的精英层更倾向于对再平衡战略在“有关于中国”和“针对中国”之间作出区分。尽管再平衡战略所宣称的重点在于外交，发展与国防三点，但中方大部分与会者更强调其军事层面的含义；部分与会者建议，美国需要“再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即针对中国的顾虑作出调整和让步。

可能将美国和中国卷入潜在的冲突。在这方面朝鲜得到了最多关注，但中方与会者的顾虑也集中在日本和中国东海的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上。菲律宾和越南（因涉及中国南海领土争端）也被偶尔提到。但中美双方与会者认为这些冲突升级为核冲突的危险几近于无。

当讨论对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时，中方与会者对美国所持的立场尤为不满，认为美国偏袒并支持日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方特别不满于克林顿国务卿对此争端采取的处理方式，并殷切期望新任国务卿克里改变态度，中国认为他的言论较为全面平衡且能理解中国的顾虑。

几位中方与会者继续批评美国在亚洲的联盟政策，强调了延伸威慑（ED）的不稳定性，并指出美国近几年一直试图加强延伸威慑（ED）。美方与会者着重指出延伸威慑（ED）具有稳定地区安全的效果并有益于在亚太地区防核扩散。然而较过去而言，此次中方与会者更多地肯定了延伸威慑（ED）在防止日本（和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能力方面的作用。然而，一位中方与会者指出，虽然延伸威慑可能有正面的影响，华盛顿政府应明智地选择不要过度依赖它，因为“过量的好东西也可能变成坏东西，正所谓过犹不及”。

由于以往的会议越来越多地提到造成诸多问题的威胁来自网络空间及太空由于以往的会议越来越多地提到诸多新威胁正来自网络空间及太空，此次会议第一次将“跨域威慑”纳入专题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倾向于美方主导这场专题讨论；在近几年的会议中这是唯一一次美方提供了一位发言者和中方只提供了一位讨论者。这是我们的中方合作伙伴特意提出的要求。美方发言者一开始谈到，很多人对“跨域威慑”这一概念并不满意。事实上，在地面，海洋和空中等传统领域跨领域的威慑和相关作战准则早已存在。然而今天，大多数美国（和中国）在陆地上，空中，和海上的军队都使用网络领域和空间领域。美方发言者解释说，“跨域”仅仅是指从一个领域（尤其是新兴领域如网络和空间等）发动的攻击其影响到实体世界的其它领域，此外，一些独立领域内的军事行动也可能引发对方的跨域回击，这会影响到威慑效果，常规冲突升级和危机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美方发言者认为，今天的新问题是在网络和空间也存在着潜在的战争升级的风险。有时可能是一个国家有意地要升级危机或冲突。然而，问题是这可能使双方之陷入螺旋升级的风险中，尤其是当双方并不清楚对方将如何回应的时候。冷战期间，与托马斯·谢林的理论论述不同，常规冲突逐步升级的途径从来不具有连贯性，可交流性和普遍的认知性。但大家对跨越核门槛的危险性有一个广泛的共识。今天，美国和中国（和其他国家）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框架来理解网络攻击和空间攻击在危机升级中的作用和途径。

美方发言者强调，一个双方认可的框架不可能为双方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南。但是它描述出了一个常见的升级途径，提供了一定的行为准则，将使决策者更好地预测相关行为的可能后果，哪些行为会越过红线，因此导致升级等等。在如何评估网络空间或外太空里发生的攻击方面双方还没有共识。双方能就此达成一个框架协议吗？比如，只有用动能攻击回应动能攻击才是适当的反应吗？用动能攻击来回应非动能攻击一定意味着冲突升级吗？用网络攻击来回应巡航导弹攻击是适当的吗？当一个领域内的攻击行为影响到另一领域时，官员们如何评估和比较其影响？

实际上无论其涉及多少领域，由于需要考虑到影响和可能的反应，提出一个共同认可的框架是很困难的。美国和中国官员往往通过意识形态，政治，理论，历史等不同的视角来解读事件。很多问题因此需要得到解决。比如，如果中国用反卫星武器发动动能攻击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美国和其盟国以非动能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卫星以使其不受中国太空跟踪能力的威胁，这会被中国看作是软弱的姿态吗？用动能攻击来打击中国的反卫星能力是

否会被认为是过激反应？如果反击行为跨越了地理界线（假设目标在中国大陆）这种反击一定是冲突升级行为吗？

美方发言者还建议美方发言者认为，解读对在网络空间和太空实施的攻击行为也取决于其发生的具体背景。例如，一旦常规战争已经开始，攻击军事卫星和计算机网络可能会在预期之中并被接受，但这些攻击行为在和平时期是不被接受的。尽管如此，美方发言者强调，任何影响到对方核能力的攻击行动应另当别论：美国和中国都可能视任何针对其核能力的攻击为非常严重的行为。

美国和中国可以实施的举措来缓解误判和跨域升级产生的危险。于此，大卫·甘普特和菲利普·桑德斯的新作《权力悖论：脆弱时代中的中美战略克制》（2011）是非常有帮助的。简而言之，寻求绝对安全不再可行，即便它曾经是可行的。由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既相互依存的又有潜在的敌对，彼此之间在核，网络空间，和太空领域等方面的相互脆弱性与日俱增。在这些领域发展有效防御很不现实，实施军控的难度也很大，所以双方很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攻击性力量以对对方进行有效威慑。因此，美国和中国在这三个领域中应该寻求建立以有效反击能力为基础的相互威慑关系，并在运用攻击性力量方面寻求相互克制。双方应该寻求一份战略克制协议，包括相互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或反卫星武器或率先攻击对方的关键计算机网络。这种相互克制保证应该通过经常性的高层交流，对彼此的能力、战略、政策进行沟通，并采取切实的建立信任措施来进行加强，以避免误解，增强信心，并建立信任。

中方的讨论者提出“跨域威慑”这一概念是无益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暗示中国和美国处于冷战状态，而双方关系并不是处于冷战状态。一个更好的概念是“跨域威胁”。讨论“跨域威胁”可以使双方更多地探讨现实中双方都正面临的的具体威胁。比如网络攻击，有可能影响核设施的运转。防止这种事态的发展对北京和华盛顿都有益处。

与此同时，中方的讨论者宣称，美国已经在开发跨域打击能力并正在通过其联盟网络采取行动，这会直接损害中国的利益。北京在此方面已颇为克制，但必要时也会作出适当回应，这将有可能威胁双方之间的战略稳定性。中方的讨论者坚持互信是解决此问题的最佳答案并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达成双方认同的行为准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重要的是通过多边框架开始此项工作。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应加强交流，建立信任。二轨或一轨半对话会有所帮助。

美中双方的与会者大致同意开展一个更广泛的对话美中双方的与会者总体上同意应该开展一个更广泛的对话，而不是仅仅片面地关注于核动态。对导弹防御，空间，网络，常规武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的讨论是有必要的。例如，我们曾在会议上针对反卫星武器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开展讨论。但中方担心过多讨论“威慑”或过于关注核领域议题会突出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对此，美方的与会者强调要区分“和平时期的威慑”，“拒绝性威慑”和“惩罚性威慑”的不同。明确这些概念的意义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减少威慑失败和冲突升级的机会。

一些中方与会者以利用一些中方与会者认为利用 Stuxnet 蠕虫病毒袭击伊朗核铀设施是使用进攻性能力的一个例子。他们认为这是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并担心这种攻击为将来类似的攻击树立了危险的先例。中美与会者同意未来可以就网络攻击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危胁展开讨论，相关讨论可以涉及如何建立信心并制定行为准则。一位中方与会者甚至建议，双方使用“跨域再保证”这个概念，而不是“跨域威慑”。

的关注焦点从跨域威慑移至中国和美国如何进行战略危机管理。中方与会的发言者认为这个讨论是姗姗来迟。为了防止冲突双方应致力于就关键概念达成共识并积极化解分歧。中国的危机管理职责分散于各个不同机构之中。虽然危机管理机制仍建立在毛泽东时代制定的核心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这些机制已经在最近几年得到显著改善。现行的机制包括预警信号，建立信任措施和特使交流。热线和二轨或一轨半外交已成为危机管理的重要工具。

中方发言者明确说台湾不再是首要的潜在危机。相反，更多的可能性是在中国东海（与日本）及在中国南海（与菲律宾）出现海上冲突。另一种可能性是朝鲜半岛出现危机。这些危机很可能跨域发生，并有可能升级到核冲突水平。

发言者中方发言者敦促中国和美国重视优先危机管理，由于中美的相关操作原则非常不同，两国应谋求达成相互共识。双方必须建立双边危机管理机制，以提高危机期前后的沟通。最后，应优先提倡防止危机的预防性措施。虽然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仍有不少紧张因素会推动双方朝对抗和冲突的方向发展。因此，双方必须认识其重要性并努力管理危机，控制其后果。

发言者解释说，美国的危机管理方法是基于西方普遍的传统和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特别经验。此危机管理方法侧重于关注引起危机的政治军事因素及其解决方案。意识形态的竞争

推动了冷战的发展。为逐步降低紧张局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强调采纳务实，非意识形态的步骤，以避免敌对行动。同样，误解和误判可能迅速升级为核对抗的危险，这使得建立机制和协议成为政策首选，通过深化透明度和鼓励对话则促进了长期的军备竞赛稳定性并直接减少了危机的直接起源。

美方发言者认为，古巴导弹危机对美国危机管理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古巴导弹危机重塑了美国对发送明确的、可信的信号对准确判断对方信号的必要性的理解。美国在冷战期间认识到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秩序的常态，而危机是破坏和平稳定的非正常状态。美国因此建立了一套高效的有利于集中决策的危机处理模式，可以让美国总统通过整个官僚体系和指挥链随时跟踪事态发展，咨询顾问，作出必要的决定。

相比之下，中方更多地通过演绎的方法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一份相关的资深研究《理解外交决策：基于中国的案例》（1979），指出了中国思维方式中关于危机的六个关键特征：1）危机仅仅在行为和信号的层次和强弱上不同于其他状态；2）危机带来了扩大自身利益的机会同时也带来压力和危险；3）危机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并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互相竞争的，不稳定的，脆弱的，动荡的，对立的，不断变化的性质；4）危机主要由内因决定（至少在初始阶段）；5）危机中国家需要利用国家实力综合运用对抗和妥协等手段；6）危机会延续很长时间。另外一份研究分析《管理中危机》（2006年）指出了美中纠纷中常见的特征。此类危机一般 1）会出现在整体双边关系呈现对立的时期；2）通常涉及第三方；3）发生在不涉及美国核心利益但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域；4）呈现出国家和军事实力的不对称和 5）涉及国内的矛盾和挑战。

中国文献一般把危机管理视为源自外国的概念。美方发言者称近年来危机管理在中国似乎已经受到明显的重视。在《管理中危机》一书中，王缉思和徐晖描述了中国通常使用的了解和管理危机的四个步骤：1）确定谋求的利益和目标；2）收集和分析信息；3）提出可能的方案并预测其可能的结果，以及 4）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并予以执行。美方发言者认为，这种模式没有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留下任何与对手对话的余地。也似乎没有考虑到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更多的是这个危机管理模式似乎是封闭的，而不是双向的：对事态的分析被设定是不会出错的，对话只是结果而非手段，所作的预测被认为是不会发生偏差的。

根据中国学者中方发言者称，中国的危机管理的概念，可以归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主席归纳出的两个进行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第一个方针政策是要坚持政治和战略原则但保持战术灵活性。第二个方针政策是不打第一枪，不打无准备之仗，并且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这个逻辑表明，中国危机管理的根本动机是寻求政治或战略利益最大化。美方发言者认为，中国愿意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态度表明，中国的政策是虽然应当尽量避免冲突，但如果紧张态势有利于中方的政治和战略利益，中国就会愿意采取敌对行动。虽然自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在危机中使用武力的意愿已经明显下降，但目前军事实力的相对平衡正变得利于中国，这就出现了有意思的问题，即北京将来会不会更倾向于使用武力。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发送的危机信号在外国（包括美国）的观察员看来往往是模糊不清晰的。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在与美国的危机中，中方不倾向于采用可信的，私密的，畅通的对话和沟通渠道，特别是在局势紧张的时候。中国继续犹豫于是否进行深入的军方对军方的交流，表明北京仍然怀疑危机对话的价值。最后，中国的决策者在危机中经常想先建立起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共识，这意味着决策者不会及时地与外界进行沟通，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危机双方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

中美之间存在五个重要分歧，它们互相关联，影响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首先，因为使用武力可能有着意想不到的后果，并导致更大的冲突的，美国通常视使用武力为最后的手段，而中国似乎把使用武力作为一种体现决心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甚至作为一种用于防止更严重冲突的有效工具。其次，美国倾向于利用正式的，明确的，永久的协议来解决引起危机的根源，并从根本上降低发生潜在的危机的可能性，而中国似乎更关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利用非正式的临时性协议来确保在未来行动中的灵活性。第三，美国重视在危机过程中进行对话和沟通的重要性，而中国似乎不太情愿建立危机对话机制。第四，和前一点相关的是，不同于美国，中国的决策过程大多是向内集中的，强调收集信息，建立共识，以系统地全面地实施计划，但这也使其在危机过程中难以与外界沟通，使得对话难以发挥作用。最后，北京倾向于使用模糊的、间接的外交信号，这样一来，即使有些事情并非中国的有意操作，也会使对方怀疑中国可能扮演了挑衅的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此，美方发言者建议，美国和中国针对危机管理的努力应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尤其是考虑到美国与中国日益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建立起能够禁得起压力考验的危机管理机制（如热线电话）尤为关键。美方发言者

建议简化和捋顺危机决策过程。最后，美方发言者说，中美两国必须在战略信号、决策制定和可能的危机情景等方面加强对话，提高透明度。

在讨论中，美方和中方的与会者一致认为，加强沟通是成功的危机管理的先决条件。然而，美方与会者指出，单单只改善通信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的危机管理和预防冲突。对于信号的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互联网和实时媒体已经改变了政府的做事方式，并使危机管理进一步复杂化。一位与会者指出，在过去不被报道的军事演习，因为媒体日益增长的关注已经变得政治化。热线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有其自身的限制：热线通话要经过工作人员中转，高层领导人也一般不使用热线。这凸显了持续的双边军方交流的重要性。

美方与会者提出建立一个共同的危机管理词汇表对危机管理将是有益的。关键是双方需就危机的定义达成一致认识，正如中方的一位与会者指出“美国对朝鲜核试验的关切度远不如其对发生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争端的关注度。”这一观点使中方呼吁“双方需要更密切地关注另一方的关切。”另一位中方与会者强调了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并指出，当美国和中国走向新型的大国关系，双方成功管理危机的能力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应建立“行为准则”以便进行危机管理。情景模拟和演习对此可能是有帮助的。不过一些与会者坚持认为，危机是难以预料的。这需要侧重于能力的建设和技能的培训。

中美在核领域的双边互信与合作

会议的第七部分探讨了美国和中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双方的信任和合作。美方发言者提交了关于“构建长期稳定合作的美中战略关系”的中美专家“二轨”联合研究成果。这项研究由美国和中国的专家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CACDA）的资助下完成。研究报告可在以下链接中浏览：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issuesinsights_vol13no2.pdf

这项研究的重心是加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相互战略再确认，即构建符合两国利益的稳定合作的“双赢”关系。由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将塑造 21 世纪的未来，打造一个稳定的合作的战略关系将不仅有助于避免危险的军事竞争，对抗，甚至是两国之间的冲突，而且它也提供了一个行动的平台，以应对全球的政治，安全和经济挑战。它将使两国领导人可以

把有限的精力、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源用于解决紧迫的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和其他优先事物。

众所周知，美国和中国在谋求更广泛的战略合作上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比如长期存在的对台政策分歧，及对彼此的军事意图，计划，方案，和活动上的不确定性。这些挑战既存在于战略层面，也存在于区域层面。但是两国也有建立更广泛合作的基础，包括两国之间经济上日益的相互依赖性及两国领导人对双方关系重要性的认可。美方发言者认为未来可行的双方对话和合作可以在以下五个领域内展开：

- 重中之重是中美两军及国防单位之间应有一个有力并持续的沟通交流和其他类型的官方来往渠道。这样的交流应该不受双方整体关系跌宕起伏的干扰。
- 美中之间需要美中之间需要一个相互战略再保证的进程，以减少误解，降低相互的不确定性。首先，专家和官员应该坦诚地讨论相互之间需要战略再保证的原因。接下来谋求在官方层面达成关于原则或指导方针的共识，以规范美中相互战略再保证的进程。与此同时，为达成相互战略再保证，应在一轨半和官方外交对话层面探索可行的构建互信措施的动议，包括加强对话，共同分析研究，沙盘推演，互访和联合军事行动。
- 尽管美国和中国之间在透明度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但在这方面做出进一步尝试的时机业已成熟。首先可以开展一系列的就每个国家各自的利益，风险，可能性和透明度限制等观点进行讨论的专家对话。美国和中国还是不太明了彼此在此问题上的考量。随后，以渐进的方式加大透明度，这会增加双方对信任和透明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的理解。另外，中方建议应先着重于意图的透明而非能力的透明，这也是一个有益的办法。还有是需要重新思考对等互惠原则，从一对一匹配透明转至一个新的提高透明的方法。美方发言者建议“不对称互惠”原则将接受中国和美国在所公布的信息数量，类型，时间和细节上可能存在的差异和不对称性。
- 美国和中国双方签署传统的军控条约尚为时过早。即便如此，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的一部分，双方可以开始就军备控制核查技术，实践和经验等展开对话。低调地就进攻/防御，空间和网络领域的非正式相互战略克制概念进行讨论也将是有益的。相互战略克制将建立在两国的单方面克制上。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减少相互的不确定性，并建立战略合作的习惯。

- 最后，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对话去加深了解防扩散政策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确定合作领域，以及如何弥合或减少这些差异。加强在核安全和核安保方面的合作符合中美两国在东北亚乃至全球的重大利益。中国经常被认为是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良好协调者，这为中国对加强全球防扩散努力做出贡献提供了机会，中国可以推动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补充议定书”的普遍遵守，推动联合国安理会（UNSC）1540决议的执行，确保即将到来的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取得成功。

发言者强调两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美国的核武库比中国的大得多。然而，中国的最低威慑战略仍然确保了双方之间的相互脆弱性。犹如冷战期间，现今中国和美国双方也都在寻求防止战争。

发言者强调了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中国担心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及其发展，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核武器现代化。第二，华盛顿和北京政府似乎并不了解对方的核战略；美国对中国的“核长城”的指控就是例子。最后，中方发言者指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信任赤字使双方“经常妖魔化彼此”。

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应加深2轨和1.5轨对话。虽然一轨对话是最终目标，但通过非官方的轨道继续讨论核战略是最好的。同时，双方应加强核安保的合作和对话。

中方与会者对中美军方交流包括在核问题上的交流提供了积极的口头支持，但提出这样的军事对话交流应当确定“适当的主题”，强调有必要共同制定议程。与以往的会谈讨论一致，中方与会者没有指出具体应该如何推动中美军事会谈付诸实施。

一些中方与会者承认，出于担心中美核对话可能重复美国和苏联核会谈的“对抗性”模式，中国一直在抵制正式的双边核对话。也有人担心一旦与美国进行核战略对话，中国将被要求立即在透明度上作出让步。未来的讨论应该关注于研究推动核透明度的新方法并更多地交流双方的期望和顾虑。

在呼唤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时虽然北京在呼吁建议新型的大国关系，中方与会者仍然认为中国希望双方的关系建立于相互脆弱性和相互克制的基础上。他们认识到美国在这方面有不同看法。

与在以前的会谈中一样，中方与会者，无论是私下里，或甚至在公开的讨论中，都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只是一个政策执行单位，强调其在中国的核政策发展中不发挥作用。虽然未来并不应该排除二炮参与双边核对话，但有关的讨论重点应更多地放在具体操作和程序层面的问题上。

综合意见和未来举措

然而非常明显的是，过去的会议使得双方相互熟悉，这使得本次讨论在整体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特别是在讨论将来潜在的合作，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如何定义及保护“共同利益”等方面。中美双方与会人士都非常重视以一轨半和二轨外交的方式来参与讨论核战略及相关政策，认为如果未来官方对话得以启动，目前的讨论将为官方正式对话奠定基础，并将确保对话开展的进度。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对话中，中方的与会者并没有强调其平常的关注点。他们几乎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也未进一步呼吁美国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也较少提到对美方舰艇入侵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不满。在上次会议上对于海空一体化战争进行了激烈讨论，但并没有在此次会议中被提起。

是 2013 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其被引述为美国敌对意图的最新“证明”。中方与会者援引了国防授权法案中“针对”中国的具体条例，特别指出其中要求美国战略司令部递交一份有关中国地下隧道网络涉及藏匿大批核武器的研究报告。由于奥巴马总统签署通过了这项立法，此最新《国防授权法案》也被看作是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在一份认真准备的声明中，中方一位长期参与核武器研发的资深退休官员断然并公开地否认了中国在隧道里藏匿核武器。总体观察而言：中方与会者，可分为两类：核心圈里的专家：他们具有务实和前瞻性思维的特质；以及只看重罗列肤浅的谈话要点的圈外人士。在核心人士当中，尽管对双方当前的战略关系状态有一些轻微的失望，但他们普遍对于推动中美双方进行一轨半/二轨外交及一轨官方正式对话的前景持审慎乐观态度。虽然一些旧的话题（绝对安全，双重标准等）时不时地出现在对话中，但中方与会者分析了双边战略关系上已取得的进展，许多核心人士与美方同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起到了良好的激发讨论的效果。

美方传递的主要讯息是：双方应该继续着眼于共同利益;应该尽早启动 1 轨正式官方对话;双方应该一起在概念层面探索共同面对的挑战（例如进攻/防御稳定性，跨域升级等等）;双方应着重于未来的合作，而不是沉湎于过去的“不快”;双方应共同研究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而避免纠缠于不能合作的领域。

毫不奇怪的是，在总结发言中，双方与会者大力支持继续这项中美战略对话，并提出可以增添一个模拟核危机场景的桌面演习,比如可以讨论如何应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危机。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评估，我们认为未来双边对话的主题可以包括更加深入地探讨多边军控方案（尤其是在五个常任理事国（P5）范围内）；跨域威慑和保护“公共利益”；危机管理（尤其是确定潜在的核危机）；更好地从技术层面了解关键领域的军事能力，而不是通过传闻进行臆测；研究网络攻击的危险性；威慑信号如何发挥作用及为何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可以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例）；以及进行战略相互再确认的关键要素等。进一步讨论如何理解习近平所期待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会谈也将是有益的；中方与会者曾频频提到“新型大国关系”，却未能充分阐释这一概念。中方表示愿意在核军备控制核查手段和相关实践方面进一步加深理解。

会议报告

首届中美空间安全对话

在中美战略核动态对话结束后，为探讨解决中美在太空领域日益增长的战略相关性问题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太平洋论坛于1月30日主办了首届中美太空安全对话。此次对话得到了隶属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反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先进系统和概念项目及美国国防部国防威胁降低局的资助。对话汇聚了大约40名来自中方和美方的专家、官员和观察员以及八位太平洋论坛青年领袖。会议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出席了为期半天的太空安全政策对话。

太空安全

对话的第部分集中关注于主要的概念定义及比较中国和美国对太空安全的看法对话的第一部分集中关注主要的概念定义并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对太空安全的看法。美方发言者定义太空安全为“不受外部干扰，损坏，或破坏地在地球大气层外放置和操作相关资产。”他解释说，太空安全问题不是新问题，并提醒在冷战（1958-1962年）早期，美国和苏联的空间核试验产生的电磁脉冲损坏了卫星。这导致了“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的签署；条约禁止除地下外的所有核武器爆炸试验。此后相关国家还签署了诸如“联合国责任公约”（1972年）和“联合国登记公约”（1975年）等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期间，太空资产的安全和双边核稳定性之间已经存在着明确联系。

自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参与航天项目的国家和在轨卫星数量一直在快速增长。太空军事项目数量也有所扩大。由太空轨道上的碎片衍生的危害大大凸显；据估计，目前大约有17,000块大型碎片在太空轨道上。由于目前预警系统的不足以及尚无有效跟踪更小碎片的能力，这使得太空垃圾的危险性更加突出。

然后美方发言者提及美国对中国太空政策的担忧。美国国会抱怨中国对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间谍活动，2007年的反卫星试验引发了华盛顿政府的极大关注。北京似乎在发送互相矛盾的信号：外交部发布了有关“和平利用”的宣示，但解放军却把此试验描述为其空间反制能力的一部分。此外，中国对美国提议举行双边太空军事会谈的反应不很积极。

近来更多太空合作的例子包括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迈克尔·格里芬2006年的中国之行。此行促成了地球观测和太空科学中美联合工作组的建立。格里芬的继任者，查尔斯·博尔登，在2010年也访问了中国。在政治层面，2009年奥巴马-胡锦涛峰会的最后正式文件提到了美国与中国的太空合作。两年后，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建立双边太空安全对话。

2010年美国国家太空政策涉及到太空安全时强调“共享和共同利益”，以及“开放”原则。同样重要的是“通行权和太空活动不受干涉。”此外，文件还着重指出，美国将寻求与外国伙伴合作加强对无线电频率干扰的识别和定位，以应对干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强调，美国寻求“在一个安全的太空环境内，负责任的国家可以在太空活动[...]而不需要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2012年美国国防部的太空政策，提出了对“有目的地干扰”美国的太空资产的担忧，强调这是“和平时期内不负责任的行动并极可能在危机中导致冲突升级。”该文件还指出，美国“将保留在其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反击的权力，”同时强调建立联盟和减少脆弱性的重要性，并保留使用商业和非太空资产的能力。

美国和中国，美方发言者认为，美国和中国应该开启双边太空安全外交磋商以实现保证互不干扰，增加数据交换，并暂停武器试验等目的。双方应讨论并推动国际行为准则的制定，并应对此进行联合研究。华盛顿和北京应该进行轨道碎片监测的合作。最后，双方应通过对话，参观和其他途径建立避免危机发生的相关机制，加强双边军事互信。

美方发言者最后强调，美国和中国有共同的利益，即确保太空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得到进一步开发。目前的相互隔离孤立对双方都不利。但取得进展将需要高层的重视：军事/外交谈判可以帮助找出共同点；对太空武器发展的相互克制和联合监测可以帮助建立信任；太空安全合作可以有助于加强民用和商用太空合作项目的联系。

中方发言者在演讲前强调，他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他赞同中国和美国等大国在保持太空的稳定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然而，问题是，中国眼里的太空领域的主要威胁和美国眼里的主要威胁并不相同。而且，不像美国，中国主张签署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PAROS）的条约。

尽管如此，中方发言者同意中国和美国存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如太空碎片。他也指出，2009年11月胡锦涛和奥巴马关于外层空间合作联合协议为推动美国与中国的太空对话迈出了积极一步。然而，中方发言者强调在中国看来来自美国的信号令人迷惑。2011年

4 月通过的开支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规定，禁止美国宇航局与中国的相关机构沟通联系，不允许美国宇航局官员访问中国的设施，美国国会也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中方发言者认为，这些措施让中国难以理解，构成了发展双边对话的严重障碍。中国人觉得受到美国相关法律和法规的“羞辱”。

会议的基调是非常积极的，双方都就加强太空安全问题的双边合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尽管如此，中方的与会者一致认为，中方觉得在太空合作领域遭受美国的法律限制的“一再羞辱”，而这是妨碍展开双方对话的一个重要障碍，必须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加以解决。美方与会者回应着重强调美国国会的这些限制只涉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活动，并不会阻碍中方与美国其他处理太空问题的政府机构进行对话与合作。

中方与会者肯定了美国太空政策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的“整体积极”的转变，虽然有些与会者认为这个转变微乎其微。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强调涉及到太空问题，中国仍然是一个“学生”。中方还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决心在太空问题方面扮演负责任的角色。中方与会者对美国空军提供的空间碎片数据，及相遇/碰撞预警表示赞赏。

尽管对美国的动机和利益存有许多疑问，中方与会者坚信，中国现在是愿意开展太空合作的双边对话的（以前北京仅表达过对多边对话的兴趣）。可能的讨论主题包括识别双方共同的想法和目标，相互再确认，了解双方基本的利益和关切点，并展开更具体的探讨，如太空碎片，太空合作规避碰撞，以及科学和技术合作。当美方的提案开始涉及到或开始关注太空碎片问题时，中方往往视此为对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及其能力的攻击。

中方与会者试图淡化美方对中国反卫星试验的担忧，称中方的反卫星武器技术层次偏低，并且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多边会谈解决。一位中方与会者还强调，美国仅在中国的反卫星试验之后才提出愿意进行太空安全对话，这表明美国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限制中国反卫星武器能力的发展。美国空军 X-37B 轨道测试器因其据称的“擒获和破坏”卫星的能力再次被中方关注。

一位中方与会专家列举了对中国的有限威慑可靠性的担忧，并建议美国单方面承诺不部署天基武器系统。一些美方与会者指出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原因部署空间武器的可行性非常小。

会议的第二部分会议探讨中国和美国如何能够提升太空的安全性。美方发言者强调“反卫星能力”已成定局。这种能力是不能被逆转或者消除的。导弹防御系统具有固有的反卫星能力，这个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已经无法改变。但美国和中国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太空，这种依赖性还将继续增长。因此，必须保证基于太空的信息服务不受干扰，尤其是在有冲突发生时。

但是保护太空资产是困难的。和在核领域一样，在太空也是进攻比防御占优。发展可靠的反卫星武器和进攻性太空能力虽然要面临很高的技术挑战和巨额的成本，但其带来的军事影响力更是巨大的。这带来了一种内在的战略不稳定的风险，即有限的对太空防御的投资却可以极大地威胁或伤害对手。对于具有相同的或是接近的太空能力的国家，通过第一次打击损毁对手的太空资产比经受对方的首轮打击之后再寻求报复更划算，也更容易执行。这是危机的不稳定的本质 - 先发制人比报复性打击有更大的利益优势。未来的技术发展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军事能力，也可能给未来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

美方发言者概述了三种太空局势下的相关利益诉求：在和平情况下，在危机情况下，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在和平情况下，一个稳定的太空环境可以实现最大限度利用太空的能力，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行故障和其他问题。推动实现这一状态的措施包括：行为准则和其他以协议形式确认的“道路规则”，可强制执行的有关减少太空碎片产生的规定，联合清理太空碎片，空间交通管理系统，信任建立措施，透明机制，限制破坏稳定性的部分进攻性能力，以及有创造性的新的执法方式。

一个稳定的太空环境在危机情况下，一个稳定的太空环境可以遏制或减少对太空资产的主动攻击或其他破坏稳定的行为，并给出现危机的国家足够的时间来阻止危机升级。美方发言者指出，错误解读和错误判断是所面临的巨大威胁。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改善相关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并加强专业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不能完全阻止危机升级，但可以降低危及升级的可能性。

发言者指出太空军备控制最好以渐进的步骤来开始。军控的历史是 - 而且一直是 - 以渐进的措施为主。特别是在新兴领域，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应该放在第一位。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应该放弃他们的倡议，他们可以考虑将其推迟。美方发言者认为太空军控首先应该着眼于行为准则，然后通过有针对性的步骤来解决具体问题（例如，禁止反卫

星测试，在卫星周围设立“保持区”），最后，在核查技术支持的条件下开展实际的太空军备控制措施。

中方发言者说，行为准则可能比正式的军控协议更好。他强调，中国和美国需要朝着树立行为准则的方向迈进，正如他所说的，“双方迫切地需要它。”然后，他提醒说，中国在2007年进行了反卫星试验，随后进行了其他几个中段拦截测试，他说中国希望在太空防御方面有相关的技术储备能力。

中方发言者明确表示，中国希望加入（太空）“俱乐部”，如果美国拥有反卫星能力，中国也需要拥有。他举例解释说，北京正在发展一个有众多卫星应用，运载火箭，载人航天，月球探测计划的完整太空项目。他不认为中国将扩大其太空军事计划，但认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发展用于民用目的的与太空有关的项目。在这些情况下，有必要制定针对军事和民用用途的太空管治规定。北京目前正在探索如何通过透明或建立信任措施来最好地达成这一目的。

在讨论中认为，由于美国致力于谋求太空主导地位 and 太空武器化，所以美方还在持续抵制俄罗斯和中国关于签订太空军控条约的建议。中方与会者也表明了中国愿意讨论其在日内瓦所提的倡议，包括禁止测试陆基系统。中方作出的表态是有值得欢迎的积极意义的。中方首次表示外太空安全应该包括地面系统（比如地面站），也表示欢迎就限制太空攻击性行为进行讨论。而之前中方一直对限制行为的讨论持抵制态度。

说华盛顿对太空条约的疑虑主要是由于其不可核查性，并且鉴于俄罗斯和中国在防扩散领域有不严格遵守条约的先例，美国有理由怀疑中俄是否将认真遵守太空条约的规定。中方与会者回应说，核查的问题并非不可解决。中方认为太空核查是“重要的，但不是不可或缺的”，并指出其他条约如“外层空间条约”，也不可核查。况且，美国还可以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随时选择退出条约。

双方的讨论再次强调了控制危机升级的重要性，这一次是针对太空领域。一些与会者建议对承诺不首先使用太空武器给予更多的思考和探讨。在此过渡期间，应采纳其他形式对太空活动进行控制或规范。

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比如缺乏强制性，过于重视太空碎片而忽略其他问题等。但中方普遍同意，应该继续推动此类努力，包括那些旨在在缔结条约的努力。中方一再重申，中国对太空行为准则持“开放”态度，一位与会者甚至称其是“非常重要的”，并指出中国正在与欧盟讨论这个行为准则倡议。与几年前中国的态度相比较，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

最后，中方与会者特别强调指出，一些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和日本都在投资空间计划。因此，多边的会谈讨论也非常重要。各方目前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避免太空武装冲突。

综合意见及未来举措

作为首届对话，这次对话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事实上，许多与会者都把此次会议描述为一个“彻底的成功”，并普遍同意应继续此对话。中国和美国的与会者都以开放和真诚的态度进行了非常有实质性的讨论，整个对话的气氛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这表明将来的太空对话，应该紧随双方战略核动态对话之后开展，或者以其它方式与双方的战略核动态对话进行紧密结合。多年来的战略核动态对话已为卓有成效的政策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阻碍进步的重要障碍和许多误会和误解仍然存在。未来需要就在太空间领域中国和美国共享的观念和目标作更深入的探讨，以使双方能够有效地增进互信，比如如何对空间碎片进行管理，如何通过合作避免太空资产的碰撞，以及如何开展科技合作等等。下次对话还需要更深入地探讨中国和美国如何能够同心协力建立一个防止太空武器化，控制升级，避免太空武装冲突的合作框架。

Appendix A

附录 A

The Seventh China-US Dialogue on Strategic Nuclear Dynamics

第七届中美战略核动态对话

A CFISS-Pacific Forum CSIS Workshop
January 28-30, 2013, Beijing, China

Conference Agenda

会议议程

January 28, 2013

9:00 **Opening Remarks**

Chinese presenter: Chen Zhiya

US presenter: Admiral Dennis Blair

9:15 **Session 1: The Strategic Set-Up and Nonproliferation Environment**

What are the Chinese and US perceptions of the current strategic nuclear and nonproliferation environments? What are the primary trends and concerns? What are US and Chinese priorities in nuclear policy? What are the nonproliferation challenges? What are Chinese and US perceptions of these challenge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an Iranian nuclear, or near-nuclear capability on inspiring further proliferation and on Mid-East political stability?

US presenter: Elbridge Colby

Chinese presenter: Hu Yumin

10:45 Coffee Break

11:00 **Session 2: Iran and DPRK Nuclear Issues**

What are US and Chinese perceptions of and approaches to the DPRK and Iranian crises as they relate to noncompliance?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hat are the prospects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to respond to the DPRK and Iranian challenges? How c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operate to strengthen the NPT and reduce the risks of noncompliance? Are Chinese views on US counterproliferation efforts like the 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PSI) evolving?

Chinese presenters: Hu Xiaodi / Fan Jishe

US presenter: Lora Saalman

12:30 Lunch

13:45 **Session 3: The Future of P-5 Arms Control**

What is the appropriate framework to engage in multilateral arms control? What are the alternate structures and goals for future multilateral arms control? What actions should the P-5 (or P-5 plus India and Pakistan) be taking now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nuclear stability? At what level of US/Russian arsenals would China b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arms control talks? What specific arms control steps can China undertake in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s as negotiations proceed?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is the status of the P-5 nuclear glossary? C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operate in a P-5 framework on other issues, such as verification? Is global zero practical? Achievable?

US presenter: Linton Brooks

Chinese presenter: Li Hong

15:15 Coffee Break

15:30 **Session 4: US Rebalance to Asia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US-China Strategic Stability**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rebalance to Asia for the US nuclear umbrella, notably on missile defense?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strategic stability? What is China's perception of Japan's ABM efforts vis-à-vis the DPRK?

Chinese presenter: Yao Yunzhu

US presenter: Brad Glosserman

17:00 Session Adjourns

18:30 Dinner

January 29, 2013

9:00 **Session 5: Cross-Domain Deterrence**

What is cross-domain deterrence? How does it work? What does it include? How does it fit into exis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How could it fail? How do incidents in one domain instigate incentives for escalating in another domain?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strategic stability? How c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operate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cross-domain deterrence?

US presenter: Elaine Bunn

Chinese discussant: Guo Xiabing (for Yang Mingjie)

10:30 Coffee Break

10:45 **Session 6: Crisis Management**

What are US and Chinese theories of crisis management approaches? How do these theories translate in practice?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hat lessons has each side learned from its experiences with acute international crise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strategic stability?

Chinese presenter: Zhang Tuosheng

US presenter: Abraham Denmark

12:15 Lunch

13:45 **Session 7: US-China Bilateral Confiden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Nuclear Realm**

What are the core requirements and organizing principl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move toward greater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build mutual trust? What are the next steps that both countries could take to enhance strategic reassurance? Specifically, what nuclear-relate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ou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omote? What forms of missile defense transparency would be valuable for China? What sorts of warhead build end state declaration by China would be valuable for the US? Short of negotiated inspection regimes, what concerns about verification might each side have, and how can those be addressed?

US presenter: Lewis Dunn

Chinese presenter: Sun Xiangli

15:15 Coffee Break

15:30 **Session 8: Wrap-Up**

What are the meeting's key findings? What are the next step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ow will the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 China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team in the US impact bilateral nuclear dialogue?

16:30 Closing Remarks

18:30 Dinner

The Seventh China-US Dialogue on Strategic Nuclear Dynamics

第七届中美战略核动态对话

A CFISS-Pacific Forum CSIS Workshop

January 28-30, 2013, Beijing, China

Participant List

与会者名单

Chinese Participants

Hu Side is Academician, Former President,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Chen Zhiya is Secretary-General,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Studies

Fan Gaoyue is Sen. Col. Senior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World Military Studies,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of PLA

Fan Jishe is Deputy Director, 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o Xiaobing is Associate Researcher, Chinese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ang Xueping is Sen. Col. Director General of Bureau of North American and Oceanian, Foreign Affairs Offi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Hu Xiaodi is Ambassador, Department of Arms Contro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u Yumin is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hi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Li Hong is Secretary-General, China Association of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Li Ji is Maj.Gen. Deputy Director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Lu Dehong is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Research,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Studies

Sun Haiyang is Sen. Col. Professor, Second Artillery Commanding College, PLA

Sun Xiangli is Director of the Arms Control Research Divis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Teng Jianqun is Senior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ng Xiaodong is Maj. Gen. Professor, Second Artillery Commanding College, PLA

Wu Jun is Deputy Director,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Xu Weidi is Sen. Col. Senior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Yang Mingjie is Vice President, Chinese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ao Yunzhu is Maj. Gen. Senior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World Military Studies,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of PLA

Zhang Tuosheng is Chairman of Academic Committee,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Studies

Zhu Chenghu is Maj. Gen. Professor,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Zhu Feng is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Zong Jiahu is Sen. Col. Director General of Bureau of Arms Control and Military Assistance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Offi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US Participants

Admiral Dennis Blair (USN Ret.) served a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from January 2009 to May 2010. He led 16 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ies, administering a budget of \$50 billion and providing integrated intelligence support to the President, Congress and operations in the field.

Mr. Robert M. Blum is with the Office of Multilateral Nuclear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Ms. Jennifer Bradley is an analyst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USSTRATCOM/J55.

Amb. Linton Brooks served from July 2002 to January 2007 as Administrator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s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e is now an independent consultant on national security.

Dr. M. Elaine Bunn is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a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Mr. Elbridge Colby is a research analyst at CNA. He previously served in a number of government positions, including on the New START negotiation and ratification effort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as an expert advisor to the Congressional Strategic Posture Commission.

Mr. Ralph A. Cossa is President of the Pacific Forum CSIS in Honolulu.

Mr. Abraham Denmark is Vice President for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ffairs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Dr. Lewis A. Dunn is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the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Mr. William Flens is First Secretary, Political Section at the US Embassy Beijing.

Mr Brad Glosserman is executive director at the Pacific Forum CSIS.

Dr. Michael Glosny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Dr. Robert H. Gromoll is Director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 Office of Regional Affairs.

Mr. Paul Hedge is US Defense Attaché Office in Beijing.

Dr. Dana Johnson is Deputy Director,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Policy, Office of Missile Defense and Space Policy (AVC/MDSP) Bureau of Arms Control,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AVC)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r. Kerry Kartchner is Senior Foreign Policy Advisor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Research and Dialogues, Strategy and Plans Directorate of the 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Mr. Bruce W. MacDonald is Senior Director, Nonproliferation and Arms Control Program at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Dr. James Clay Moltz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r. Erik Quam is a Foreign Affairs Officer, ISN/R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r. Brad Roberts i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Nuclear and Missile Defense Polic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r. Lora Saalman is a Beijing-based associate in at the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Dr. David Santoro is Senior Fellow fo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at the Pacific Forum CSIS.

Mr. Robert Swartz serves as the Senior Advi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s Office of Nonprolif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r. Jerry Taylor is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Affairs, Bureau of Arms Control,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r. Drew Thompson the Defense Department's director for China, Taiwan and Mongolia in the Office of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Dr. Christopher P. Twomey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with tenure) at the 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in Monterey, Calif.

Dr. Edward L. (Ted) Warner III is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representative to New START and senior advisor to the USD (policy) for Arms Control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Dr. Dean Wilkening is a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Next-Generation Scholars

Dr. Liu Chong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r. Patrick Disney is a Nonproliferation Graduate Fellow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Ms. Yun (Claudia) He is a PhD Candidat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Mr. Philippe de Koning is a consultant at the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and an MA Candidate and Mitchell Scholar, Dublin City University.

Mr. Adam Liff is a PhD Candidat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Ms. Yuan (Maggie) Ma is a Researcher a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Mr. Tong Zhao is a PhD Candidate at Georgia Tech.

Appendix B

附录 B

The Inaugural China-US Dialogue on Space Security

首届中美太空安全对话

Pacific Forum CSIS

January 30, 2013 – Four Seasons Hotel, Beijing

Agenda

会议议程

- 9:00 **Session 1: Space Security**
What is space security? How important is it? Why? What are US and Chinese perceptions of how much space security matters? What are US and Chinese perceptions on the current space security environment? D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gree on what the main space threats and risks are? What are US and Chinese priorities in addressing space security?
- US presenter: James Clay Moltz
Chinese presenter: Li Hong
- 10:30 Coffee Break
- 10:45 **Session 2: Space Codes of Conduct and Arms Control**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enhance space security? Are codes of conduct better suited than formal arms control processes? What are the US and Chinese positions on these questions?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o together to strengthen space security?
- US presenter: Bruce MacDonald
Chinese presenter: Teng Jianqun
- 12:15 Closing Comments
- 12:30 Lunch

The Inaugural China-US Dialogue on Space Security

首届中美太空安全对话

Pacific Forum CSIS
January 30, 2013 – Four Seasons Hotel, Beijing

Participant List

与会者名单

Chinese Participants

Col. Gaoyue Fan is Senior Colonel and Research Fellow at the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Maj. Gen. Xianfu Gong (Ret.) is Vice Chairman at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Ms. Hua H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Arms Control & Disarmament Pek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r. Hu Yumin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Li Hong is Secretary General at the China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ssociation.

Mr. Jianqun Teng is Director of 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Arms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Chi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Mr. Zhang Ze is Deputy Director at the Department of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hina.

US Participants

Admiral Dennis Blair (USN Ret.) served a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from January 2009 to May 2010. He led 16 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ies, administering a budget of \$50 billion and providing integrated intelligence support to the President, Congress and operations in the field.

Mr. Robert M. Blum is with the Office of Multilateral Nuclear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Ms. Jennifer Bradley is an analyst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USSTRATCOM/J55.

Amb. Linton Brooks served from July 2002 to January 2007 as Administrator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s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e is now an independent consultant on national security.

Dr. M. Elaine Bunn is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a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Mr. Elbridge Colby is a research analyst at CNA. He previously served in a number of government positions, including on the New START negotiation and ratification effort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as an expert advisor to the Congressional Strategic Posture Commission.

Mr. Ralph A. Cossa is President of the Pacific Forum CSIS in Honolulu.

Mr. Abraham Denmark is Vice President for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ffairs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Dr. Lewis A. Dunn is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the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Mr. William Flens is First Secretary, Political Section at the US Embassy Beijing.

Dr. Michael Glosny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r Brad Glosserman is executive director at the Pacific Forum CSIS.

Dr. Robert H. Gromoll is Director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 Office of Regional Affairs.

Mr. Paul Hedge is US Defense Attaché Office in Beijing.

Dr. Dana Johnson is Deputy Director,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Policy, Office of Missile Defense and Space Policy (AVC/MDSP) Bureau of Arms Control,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AVC)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r. Kerry Kartchner is Senior Foreign Policy Advisor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Research and Dialogues, Strategy and Plans Directorate of the 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Mr. Bruce W. MacDonald is Senior Director, Nonproliferation and Arms Control Program at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Dr. James Clay Moltz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r. Erik Quam is a Foreign Affairs Officer, ISN/R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r. Brad Roberts i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Nuclear and Missile Defense Polic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r. Lora Saalman is a Beijing-based associate in at the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Dr. David Santoro is Senior Fellow fo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at the Pacific Forum CSIS.

Mr. Jerry Taylor is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Affairs, Bureau of Arms Control,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r. Drew Thompson the Defense Department's director for China, Taiwan and Mongolia in the Office of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Dr. Christopher P. Twomey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with tenure) at the 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in Monterey, Calif.

Dr. Edward L. (Ted) Warner III is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representative to New START and senior advisor to the USD (policy) for Arms Control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Dr. Dean Wilkening is a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Next-Generation Scholars

Dr. Liu Chong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r. Patrick Disney is a Nonproliferation Graduate Fellow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Ms. Yun (Claudia) He is a PhD Candidat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Mr. Philippe de Koning is a consultant at the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and an MA Candidate and Mitchell Scholar, Dublin City University.

Mr. Adam Liff is a PhD Candidat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Ms. Yuan (Maggie) Ma is a Researcher a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Mr. Tong Zhao is a PhD Candidate at Georgia Tech.